

西班牙、 葡萄牙、 拉丁美洲文学 在中国

翻译文学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重要的一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文学的优秀作品，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陆续被翻译介绍到我国来。这些作品，同俄、英、法、美、德、日等国的作品一样，向人们介绍外国的社会、政治情况和人情世态，宣传外国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思潮，传播外国被压迫者反抗斗争的声音，开阔了人

形象的原因之所在。

列举了许多这样的女性形象，诸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高纳里尔和里根，萨克雷笔下的蓓基·夏泼以及神话传说中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女巫——女神形象，如斯芬克斯、美杜莎、塞恩、卡利、迪莉娅、莎乐美^①等。所有这些女性形象都具有高超的欺骗艺术，每每引诱男人上当受骗，偷窃男人的生殖力”（第34页）。在吉尔伯特和古芭看来，妖妇具有两重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有某种东西可以告诉别人——常常有这种可能性：她要么不说——要么说出另一件截然不同的事。换言之，具有两重性

们的眼界，启发了人们的思想觉悟。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过去多年来我们对西、葡语文学的译介，比起对上述各国文学的译介来要少一些。这种情况近年来已经大有改变。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文学之花，在翻译文学的百花园里竞相开放，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其中拉美文学尤其受到我国读书界、文学界和文艺评论界的注意，乃至形成了“拉美文学热”的景象。这种丰收场景的出现，追根溯源，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累积和发展过程的。

西班牙伟大古典作家塞万提斯的不朽名作《堂吉珂德》，是最早译介到中国来的西班牙文学作品。《堂吉珂德》的第一个中译本，是1922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本书名《魔侠传》，由林纾和陈家麟可能据英译本以文言文重译，收入该馆《万有文库》。从那时至今，堂吉珂德一直为中国人民所熟悉和喜爱。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在他的《〈解放的堂吉珂德〉后记》、《真假堂吉珂德》等文章中，对吉珂德式的行动作过多次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吉珂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他拿堂吉珂德来进行自己的战斗，说吉珂德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的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

的妇女是这样一种妇女，她的意识对男人是不透明的；她的精神不让自己遭受男人思想阴茎探针的渗入。因此，《白雪公主》中的里丽斯和王后就成了

^①高纳里尔(Goneril)、里根(Regan)，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女主角。

蓓基·夏泼(Becky Sharp)：《名利场》中的女主角。

斯芬克斯(Sphinx)：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的女怪。

美杜莎(Medusa)：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

塞恩(Circe)：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女魔。

迪莉娅(Delilah)：基督教《圣经》中参孙的情妇，曾施展美人计出卖参孙。

莎乐美(Salome)：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

是不会有”的”。中国“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假装堂吉诃德的姿态，是用来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的。鲁迅曾经想全文翻译他所喜爱的这部小说，可惜他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我国文坛另一颗巨星、新文化的另一位先驱者茅盾，1936年在他的《世界名著讲话》中，用了长长的一章描述塞万提斯的生平，并对《堂吉诃德》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称赞这部小说给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画了一幅再真切再清楚也没有的画像，是一部儿童、中年、老年都喜欢的书，一部从十六世纪到现在没有一个时候被人忽略过的书。

鲁迅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别求新声于异邦”，有意识地选择优秀的外国文艺作品翻译过来，拿外国文学这个思想武器来启迪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并为中国新文艺提供借鉴。在他众多的译著中有西班牙“九八年代”作家巴罗哈的《山民牧唱》，介绍巴罗哈以非凡的艺术手段描绘了西班牙山地的巴斯克族人民贫困和不幸的生活，说他的作品“在发笑中含着深沉的忧郁”。

茅盾对介绍和评论西、葡语文学作品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二三十年代，他写了评论诸如伊巴涅斯、阿索林、巴罗哈和爱德华多·马列亚(阿根廷)等西班牙和拉美作家文学活动的文章，还译了巴列·因克兰(西)、特·琨台尔(葡)、鲁文·达里奥(尼加拉瓜)、洛佩斯·阿布耶尔(秘鲁)、费德里科·梅尔顿斯(阿根廷)、阿卢伊西奥·阿泽维多(巴西)的短篇小说，爱德华多·巴

里奥斯(智利)的独幕剧，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建国后收入《茅盾译文选集》)。他当时所译的西班牙剧作家《贝纳文特戏曲集》和西班牙小说家萨马科伊斯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儿子》，曾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他的这些评介西、葡、拉美文学的活动，开阔了我国人民的视野，并为我国文学界打开了一个可供借鉴和学习的广阔天地。

三十年代是中国新文艺繁荣的年代，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增多了。1939年，出版了傅东华根据英文译本并参考西班牙原文本全文重译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伊巴涅斯的小说《四骑士》、皮康、乌纳穆诺、阿索林等人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都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来。

建国以前的长时期中，我国懂西、葡语的人不多。除了诗人戴望舒和翻译家庄重等人已开始从西语直接翻译加西亚·洛尔卡的诗和伊巴涅斯等人的短篇小说之外，其他许多西、葡语文学作品都是转译过来的，翻译的也多是些中、短篇作品，其中西班牙作品占绝大多数，葡萄牙和拉丁美洲作品介绍过来的还很少。

建国后，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日益开展，文化艺术界的交往也日见增加。我国出版的西、葡、拉美文学作品和评介文章，也随之日益增多。与建国前不同的是，这时更多地翻译出版了这些国家的长篇名著，从原文直接翻译的作品也增多了。1951年，

男人假想中的妖妇的典型例证。

《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两位作者还考察了父权制统治下的女艺术家的地位：“对于女艺术家来说，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的基本过程被那些干涉女性自我关系的所有的父权主义界定弄得纷繁复杂”(第17页)。这种困境带来的可怕后果则是，女作家必然要逐步遭受作者身分削弱化的忧虑之苦。如果女作者被界定为男性，而她感到自己已被男性界定为他的创造物，那么，她又怎敢不顾一切地就冒险拿起笔杆呢？吉尔伯特和古芭虽然提

出了这一问题但却没有给予回答。然而，她们紧接着又提出了另外一些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根本问题：

既然国王的声音是王后所能听到的主要声音，那么王后是否就应该尽力模仿国王的语调、声调、措词和观点而讲话呢？抑或她要不要按照她自己的词汇和音色，坚持她自己的观点而和国王去“争吵”？我们认为，这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

智利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来我国访问，当时我国就出版了《聂鲁达诗文集》。1952年，巴西著名小说家若热·亚马多和古巴名诗人尼古拉斯·纪廉联袂访问我国。我国陆续出版了亚马多著名的三部曲《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和《饥饿的道路》。五六十年代，我国出版的拉美小说还有：墨西哥何塞·曼西西多尔的《风向所趋》和《深渊上的黎明》，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的《财阀》和特雷文的《伐木工的反叛》与《草莽将军》，阿根廷劳尔·拉腊的《大峡谷》和伐莱拉的《阴暗的河流》，哥斯达黎加卡洛斯·路易斯·法拉斯的《绿地狱》，厄瓜多尔希尔贝尔特的《我们的粮食》，危地马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周末》，乌拉圭阿尔弗雷多·格拉维那的《风暴中的庄园》等。诗集有聂鲁达的《葡萄园和风》与《英雄事业的赞歌》，古巴诗人纪廉的诗选，委内瑞拉诗人利昂的《和平纪事》等。戏剧有阿根廷库塞尼的《中锋在黎明时死去》和《一磅肉》，安德烈斯·利萨拉加的《美洲的圣胡安娜》，巴西非格莱德的《伊索》，古巴阿尔丰索的《甘蔗田》等。其中《中》剧、《伊》剧和《甘》剧在我国北京、上海等地上演过，获得了观众好评。

除了这些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之外，还出版了在拉美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例如阿根廷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的《屠场》，巴西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的《腹地》，哥伦比亚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的《草原林莽恶旋风》（《旋涡》的中译书名），秘鲁塞萨·瓦叶霍的《铀矿》，古巴诗人何塞·马蒂和巴西诗人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诗选，智利短篇小说家巴尔多梅罗·利略的选集和秘鲁里卡多·帕尔马的《秘鲁传说选》。这些作品扩大了我国读者对拉美文学的了解。

至于西班牙上世纪下半叶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如伊巴涅斯的《血与沙》、佩雷斯·加尔多斯的《悲翡达夫人》、亚拉尔孔的《三角帽》等陆续译介过来，引起了我国读者的很大兴趣。在这段时期，古典作家塞

万提斯同英国的莎士比亚一样，仍是中国翻译界、评论界和广大读者所注意的中心。傅东华继1939年出版了重译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之后，于1959年出版了该书的全译本。塞万提斯的《惩恶扬善故事集》的11个短篇小说中，有6个翻译出版。1955年11月25日，为纪念《堂吉诃德》出版350周年，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集会。此外，还出版了西班牙最早的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和维加的剧作《羊泉村》的中译本。在汉译文学作品中，西班牙和拉美的作品越来越占有重要位置。

1978年，我国读者有幸读到了杨绛从西班牙语直接翻译过来的《堂吉诃德》全译本。杨绛的译本译文忠实与流畅兼备，所加的注释繁简适度，十分有助于读者对这一古典名著的欣赏和了解。该书第一版十万册不久即销售告罄，第二、三版出版不久也同样即告脱销，成为我国畅销书之一。她所译的《小癞子》先后出过五、六版之后，去年译者又为它撰写了万言长序，将这本字数不多的经典郑重介绍给读者。由于杨绛介绍西班牙文学的杰出贡献，1986年西班牙政府授予她“智者阿方索大十字勋章”。

我国出版的西班牙古典文学名著还有西班牙第一部不朽史诗《熙德之歌》和《维加戏剧选》，其中包括了《羊泉村》、《塞维利亚之星》和《园丁之犬》三个剧本。

这几年，我国西班牙文学研究者开始更多地注意十九世纪下半叶著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陆续介绍到我国来。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伟大的作家、西班牙现代小说创始人加尔多斯的作品，这时被更多地译介给我国读者，虽然介绍过来的仍只是他一百多部作品的很少一部分。继《悲翡达夫人》之后，我国读者还欣赏到了他的社会小说《葛罗丽娅》、《慈悲心肠》和《玛利亚奈拉》。他那反映十九世纪西班牙历史的、史诗般的46部《民族演义》，我国有了《特拉法尔加》、《三月十九日与五月二日》和《萨拉戈萨》等三部的译本。我国读者对这些鞭笞封建残余和天主教

会势力、充满爱国激情的优秀作品,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期望能读到他更多的作品。

我国出版社还刊行了西班牙另外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品,其中有帕拉西奥·巴尔德斯的《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玛尔塔与玛丽娅》、《何塞》;胡安·巴莱拉的《佩比塔·希梅尼斯》;克拉林的《庭长夫人》和《独生子》;伊巴涅斯的《五月花》、《不速之客》和《酒坊》,他的《血与沙》则于1983年再版。

与上述作家风格不同的、西班牙著名文学年代“九八年代”的作家中,我国出版了巴罗哈的《冒险家萨拉卡因》,米格尔·乌纳穆诺晚年的代表作《雾气》。

西班牙战后小说,好似西班牙文学研究者近几年新发现的瑰宝。这方面的作品已经翻译出版的有:卡门·拉福雷特的《一无所获》;何塞·塞拉的《蜂房》;松苏内吉的《合同子》;桑切斯·费洛西奥的《哈拉马河》;罗德里戈·鲁维奥的《尸骨还乡》和卢卡·德代纳的《上帝的笔误》等。我国读书界和文学界通过这些优秀作品了解了西班牙内战、佛朗哥统治时期和当前西班牙的社会风貌,欣赏了西班牙现代小说的不同风格和创作技巧,从中吸取了有益的艺术经验。

西班牙近当代几位大诗人的作品受到了我国的注意。“九八年代”的大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和曼努埃尔·马查多兄弟的诗作已陆续译介到中国来。洛尔卡的诗更多的被介绍过来,他的剧作《血姻缘》和《耶尔玛》也已译成汉语出版。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散文诗《小银和我》已在我国出版。值得指出的是,翻译者是西班牙一位年轻姑娘达西安娜·菲萨克。另一位西班牙诗人、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森特·亚历山德里的诗,也在中国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西班牙大诗人拉斐尔·阿尔维蒂,五十年代曾访问过中国。他的诗作这几年也陆续译介到中国来。去年,还出版了《西班牙现代诗选》。

近年来,我国对拉美文学的了解日益加

深了。相继出版的拉美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有:殖民地时期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的《征服西班牙的真实历史》;十九世纪初被誉为拉美第一位小说家的墨西哥人利萨尔迪的《癞皮鹦鹉》和《堂卡特林》;十九世纪中叶到末叶的浪漫主义小说,如阿根廷何塞·马莫尔的《阿玛莉娅》、哥伦比亚豪尔赫·伊萨克斯的《玛丽亚》和墨西哥阿尔塔米拉诺的《蓝眼盗》;现实主义小说如智利布莱斯特·加纳的《马丁·里瓦斯》、古巴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的《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和委内瑞拉鲁菲诺·布兰科的《人杰》;高乔文学作品如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高乔史诗《马丁·菲耶罗》、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的小说《堂塞贡多·松布拉》和乌拉圭弗洛伦西奥·桑切斯的戏剧,印第安小说如玻利维亚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的《青铜的种族》、秘鲁西罗·阿莱格里亚的《金蛇》、《饿狗》和《广漠的世界》、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的《深沉的河流》,厄瓜多尔豪尔赫·伊卡萨的《瓦西篷戈》;墨西哥革命小说如阿苏埃拉的《在底层的人们》和《马德里分子安德烈斯·佩雷斯》、马丁·路易斯·古斯曼的《元首的阴影》和《鹰与蛇》(即出)、富恩斯特特的《土地》;描写拉美草原和丛林风光的“大地小说”如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堂娜芭芭拉》,而里维拉的《旋涡》则于1981年再版。

本世纪三十年代起采用新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成为拉美六十年代文学“爆炸”先驱的著名拉美先锋派作家的作品译介到我国来的有: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和《玉米人》、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的中篇小说《人间王国》、墨西哥胡安·鲁尔弗的中短篇小说集和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

从六十年代开始,拉美一批新小说家吸取他们的前驱先锋派小说家和欧美现代派小说家的创作技巧,形成了各自丰富多采、新颖奇特的艺术手法。他们烙印印第安文化、欧

洲文化、非洲文化和东方文化于一炉,纷纷写出立意新奇、思想深刻、反映生活面广阔的优秀作品,引来拉美文学“爆炸”的局面并震惊了世界文坛。这批新小说家的代表人物的优秀作品近几年来我国译介的有: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他的中短篇小说集;秘鲁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绿房子》、《劳军女郎》、《胡利亚姨妈与作家》、《世界末日之战》、《酒吧长谈》和《玛依塔的故事》;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雷斯之死》等。

拉丁美洲的诗歌,在这段时期受到了我国更多的注意。何塞·马蒂(古巴)、卢文·达里奥(尼加拉瓜)、桑托斯·乔加诺和塞萨·巴列霍(秘鲁)、胡安娜·德伊巴博罗(乌拉圭)、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和路易斯·博尔赫斯等大诗人的作品,初次或更多地被译介到中国来。我国出版了智利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诗集,而聂鲁达的诗选这时又出版了两种,他的《诗歌总集》则已全卷翻译出版。此外,我国还即将出版《拉丁美洲现代诗选》。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出版的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集,这几年多达十多种,中篇小说选集一种,儿童小说选集三种,独幕剧选一种。这些选集有助于我国读者对拉美这些文学样式的了解。

葡萄牙语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在我国起步更迟,主要原因是葡语学习在我国开始晚。但是,葡语文学的介绍研究工作,近几年也开始有了起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葡萄牙古本基金会联合出版了葡萄牙古典大诗人卡蒙斯的诗选。上世纪葡萄牙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艾萨·德凯依罗斯的代表作《阿马鲁神父的罪恶》也已在我国翻译出版。巴西小说家亚马多的名著《加布里埃拉》、《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以及他早年的作品《拳王的觉醒》与《死海》,已陆续在我国印行。1985年,我国出版了巴西著名小说

家贝纳多·吉马良斯的《女奴伊佐拉》的两个不同译本。此外,《葡萄牙现代诗选》也即将问世。

西、葡、拉美文学史,有助于我国读者对这些文学作比较系统的了解。早在三十年代,我国就出版过一本由万良浚、朱曼华编写的《西班牙文学》,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但该书取材于两本英语西班牙语文学史,论述过于简略。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孟复所著的《西班牙文学简史》。该书简略地介绍了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末西班牙文坛上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对欧洲和世界文学影响巨大的作家和作品则辟有专章论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王央乐著《拉丁美洲文学》,从印第安民族文学开始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把拉美文学的主要发展线索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吴守琳著《拉丁美洲文学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则从古印第安文学到当今现代派文学,以解剖麻雀的办法,分期重点介绍了主要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此外,我国还翻译出版了智利著名文学批评家里奥塞科的《拉丁美洲文学简史》和若泽·萨拉伊瓦的《葡萄牙文学史》。还要提出的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西、葡语文学专业受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委托,正在编著用作大学教材的《西班牙文学史》和《拉丁美洲文学史》。这两本新的文学史出版后,对我国广大读者和有关教学研究单位,都会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近几年,我国对西、葡、拉美文学的评论,比前些年显著增多了。首先,这些年出版的西、葡语文学作品的译本,大都有前言或后记,介绍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等。就报刊上发表的评介文章来说,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是永不枯竭的论题。例如,杨绛的《重读〈堂吉珂德〉》(《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论述了《堂吉珂德》为什么会风行全世界的原因,指出堂吉珂德的思想体现了文艺复

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想，以及这种理想和十六世纪现实的矛盾，而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人物是又特殊而又普遍、不同一般而又典型的人物。文美惠的《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北京出版社，1981年）和张书立的《塞万提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宣传介绍了西班牙这一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及其不朽名作。西班牙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现实主义作家、“九八年代”作家、内战时期与战后的作家及其作品，在陆续翻译介绍到我国来的同时也得到了较多的评论。

西、葡语诗歌吸引了我国较多的注意。江志方的《二十世纪西班牙诗坛上的塞万提斯》（《外国文学》，1986年第8期），评价了西班牙人民诗人洛尔卡，指出他是继九八文学年代的“1927年一代”诗人中走在最前面的。赵振江的《〈马丁·菲耶罗〉与高乔文学》（《拉丁美洲丛刊》，1981年第3期），从高乔人、高乔文学谈起，重点评价了高乔史诗《马丁·菲耶罗》。赵振江的《米斯特拉尔和她的抒情诗》（《国外文学》，1985年第1期），结合女诗人的一生经历，把她的抒情诗归纳为从炽烈的情爱到深沉的母爱到人道主义的博爱转化升华的三个阶段，并对这三类诗歌的得失作了评价。江志方的《诗文垂青史，友谊传世代》（《人民日报》，1984年7月12日），评价了诗人聂鲁达不同时期的诗作，指出他的诗歌创作富有成就的阶段，也就是他把自己的命运同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我国报刊对希梅内斯、亚历山德里、阿尔维蒂、卡蒙斯、何塞·马蒂、纪廉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进行了较多的介绍和评论。

拉丁美洲现当代各种不同风格的现实主义新小说，近几年来受到中国读书界、文学界和评论界的特别关注。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成了我国研究和评论的热门话题。博尔赫斯、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鲁尔弗、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科塔萨尔、多诺索等三十年代以来的拉美名作

家，报刊上一再有专文论述他们的作品。其中如马尔克斯，就有张国培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一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该书收集了报刊评介文章34篇，包括作家生平、创作、影响、作家谈创作和魔幻现实主义五部分。详尽叙述作家本人生平和创作的马尔克斯与记者的谈话录《番石榴飘香》，也已在我国翻译出版。我国对拉美新小说的评论文章和专著中，例如林一安的《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世界文学》，1982年第6期），论述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流派的来龙去脉，从开流派先河的作品起列举几位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对该派“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创作原则及其对取得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魔幻”效果进行了分析。陈众议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古印第安文学》（《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0辑），对这个流派所表现的拉美人的“魔幻意识”追根溯源，探寻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同古印第安文学的关系，指出这个流派既反映了拉美社会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拉美人的主观现实（魔幻现实）。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堂吉诃德〉》（《读书》，1986年第2期），则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佳作和《堂吉诃德》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者的创作方法同是现实主义的，而魔幻现实主义所渲染的神奇气氛无不基于人物的魔幻意识，就象《堂吉诃德》的奇情异想无不基于人物的骑士思想一样。两者的共同特点还在于用合理的夸张、讽刺的手法和鲜明的形象，反映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心理现象。李德恩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技巧与特征》（《外国文学》，1989年第1期），指出魔幻现实主义既通过印第安人的眼睛来看世界，使万物蒙上神秘色彩而又立足于现实，因此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不同于一般的神话故事和志怪小说。另外，还指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既把欧美现代主义的种种表现手段拿来而又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并对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不同之处一一作

了剖析。林一安的《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的寻踪者》（《世界文学》，1985年第期），从详细分析阿斯图里亚斯和卡彭铁尔这两位拉美“神奇的现实”的寻踪者的艰苦探索入手，论述了拉美作家推动和形成拉美神奇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的过程，指出他们以其众多的优秀作品给现实主义注入了新鲜的含义、内容和课题。陈光孚的专著《魔幻现实主义》（花城文艺出版社，1987年），则以较为丰富的材料评介了这一流派创作中所蕴含的社会现实生活容量和魔幻神奇色彩。陈光孚的《“结构现实主义”述评》（《文艺研究》，1982年第1期）、孙家孟的《结构革命的先锋——论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作品〈酒吧长谈〉》（《世界文学》，1987年第1期）和赵德明的《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创作道路》（《拉丁美洲研究》，1987年第5期），对拉美诸现实主义的另一流派进行评介，阐明这个流派在创作中牢牢抓住拉美社会现实的同时引进影视技巧等手法，打破传统小说的直线、单一的叙述结构，创造出一种多层次、多角度、多维空间的结构，以达到使作品产生立体感的效果。赵德明的《走向世界的拉美文学》（《中外文学》，1987年第1期），对当代拉美文学在世界文坛所处的地位，对拉美六十年代“文学爆炸”中的各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及其代表作家的作品，以及当今的“爆炸后文学”的一代新作家，提纲挈领地作了评介。徐玉明的《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简要地叙述了拉美文学“爆炸”的成因，重点评介了“爆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魔幻现实主义和几位“爆炸”文学的代表作家，分析了他们作品的现实主义内容和同样新颖而又各自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

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我国对拉美现代文学关注的不仅有拉美文学专家，还有作家、文学评论家和一般读者。意识流、隐喻与象征、超出常规的时空颠倒、穿插与转换、现实和神话与幻觉的交融、复杂多面的结构

和其他新的创作手法，为不少作家所借鉴。小说家李陀在《要重视拉美文学的发展模式》一文（《世界文学》1987年第1期）中说，

“从对国外文学的译介方面来说，把拉美的当代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恐怕是近几十年最大的一件事了。”

我国对西、葡、拉美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这方面的工作毕竟还仅仅是开始，比起英、俄、法、德、日、美等国文学的译介来，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有所不及。从这些年已经做了的工作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者偏重于介绍和研究拉美当代文学，对西、葡、拉美文学从“史”的角度去研究少。从文学种类来看，对小说的评介多，诗歌少，戏剧和散文更是寥若晨星，而研究工作又做得比译介工作少。即令是比较注意了拉美当代，也还仅限于介绍为数不多的一些代表作家，对某一流派或某一作家进行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还做得少，象其他文种有计划地出一些代表作家的全集的事，还没提上日程。造成这种情况当然有主、客观原因。十年动乱之后，我国打破与世隔绝的处境，大家自然把眼光首先注意当代文学的发展，而拉美当代“爆炸”文学以其高质量又恰恰足以吸引我国译介者、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注意。从主观条件来说，我们这方面的队伍是一支人数不多而又年轻的队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与文艺理论修养，对本地区文学和政治社会情况的了解，乃至外语和中文的基本功都有所不足，需要加强学习和提高自己，才能更多更好地担负起本地区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